

不准发表的采访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不准发表的采访

· 孙淑敏短篇小说选 ·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沈阳



孙淑敏同志遗像

1995/08

作者小传

孙淑敏，女，一九三三年一月八日生于哈尔滨市。童年家境贫寒，边做童工边学习。一九五一年，在本溪市新华书店参加工作。一九五二年转到本溪煤矿劳动工资科。一九五六年调到本溪矿务局劳资处搞职工教育工作。在此期间，她接触并熟悉了工人群众，产生了用文学形式表现他们的强烈欲望。由于文化不足，她刻苦自学，不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，而且参加函授学习，直至辽宁函授学院中文系毕业。

一九六三年，她开始练习写小说，为报纸副刊投稿，先后发表了《春雨后》等反映矿工生活的作品。

十年浩劫中，她因作品受“批判”，下放从事体力劳动，身心受到严重摧残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她精神振奋，一鼓作气写了十几篇作品。但是，正当她创作旺盛时期，恶性肿瘤却侵袭了她的肌体，经过四次大手术，她的体重只剩下六十多斤了。但在患病的三年中，她又坚持写了近二十万字，其中《我的老伴》获得文学创作奖。

一九八三年二月一日下午三时五十分，孙淑敏同志不幸病逝，享年五十岁。

悼 词

(代 序)

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，哀悼令人尊敬的女作家孙淑敏同志。

孙淑敏同志经过三年零八个月同癌症的顽强搏斗，于一九八三年二月一日下午三时五十分停止了呼吸，享年五十岁。我们失去了一个好同志、好战友。

孙淑敏同志一九三三年一月八日生于哈尔滨市一个工人家庭里。一九五一年在本溪正式参加革命工作。她先后当过职员、干事、创作员和编辑。生前是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、本溪市妇联委员、本溪市文联编辑。她是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，是在全省小说创作界有影响的女作者之一。

三十年来，孙淑敏同志一心向党，热爱社会主义。她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刻苦学习，认真工作，为党的宣传工作特别是文艺工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。她先后发表在《鸭绿江》、《春风》、《光明日报》、《辽宁日报》等报刊上的几十篇小说和报告文学，为社会主义文艺园地增添了光彩。

孙淑敏同志的拼搏精神是感人肺腑的。我们含着眼泪

• 1 •

看到：她在三次手术伤口未愈的痛苦折磨下，坚持上班，认真编稿；她在医院的病床上，一手挂着滴流瓶子，一手拿笔坚持写作；她拖着弱不禁风的躯体到三十里外去采访；她为了帮助业余作者修改稿子几乎昏迷到办公桌上。

可恶的病魔夺去了孙淑敏同志的生命。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，象孙淑敏同志那样创作，象孙淑敏同志那样工作，象孙淑敏同志那样生活，为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而奋斗。

孙淑敏同志，你不愧为党的好女儿，不愧为人民的好歌手，不愧为文艺战线的好战士，不愧为读者喜爱的好作者。你奋斗一生，鞠躬尽瘁，可以合目而去了。

安息吧，淑敏同志！

本溪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

一九八三年二月四日

目 次

悼词（代序） 本溪市文联

我的老伴	1
矿工秃老美	23
眼 睛	43
拼命三郎	49
永远值得的记忆	68
一件奇案	73
光 彩	83
瞬 间	90
路	93
印 记	100
兑 现	104
不准发表的采访	112
在岗位上	128
难断的官司	134
队 服	138
鸡	142

春雨后.....	146
心 眼	150
值日生	158
白 云	163

我的老伴

我的老伴是个大字不识的粗人。三十八年前，是我妈妈用一斗苞米楂子换来的逃荒女。因为她在家里家外没地位，所以一生也没起个正经名字。年轻的时候，我管她叫“哎——”以后年龄大了又改称为“我说——”，到了晚年才亲昵地喊她老伴。

我出生于小地主家庭，又在一个名牌大学毕业。按说家里应该给我找个门当户对的小姐，可是我爸爸是个土地主，“抠”得要命，把钱能攥出水。算盘一扒拉，觉得娶个小姐还得拿彩礼，又得讲排场，人家娇生惯养的还不准能听使唤和能干活。买个无父母的童养媳，又无牵挂又省钱还能当个丫头使唤，瞧，多合算！

念大学的时候，妈妈捎信让我回家结婚。我回家后大吵大闹，凭我当时的身份娶个“屯老二”怎么能甘心呢？妈妈连哄带劝地向我说，她也知道这丫头根本不配嫁给我，可家里缺人手，先成了亲拴上她，等我大学毕了业混上个好差事，要不要她，那不是一句话。就这样，我们吹吹打打地结了婚。说是结了婚，其实我在家半个月，除了支使她干活外，没跟她说过一句贴己话。不过，我也

有满意的地方，这就是她人很老实、温顺，长的也不算丑。

四九年全国解放了。这时，我已经是洪洋河矿务局主管瓦斯通风工作的专责工程师。时正风华，雄心勃勃。我在大家的鼓动下，开始改变和根治这个矿多少年来大大小小的瓦斯事故和意外隐患。就在这时，她夹着个衣服包，风尘仆仆地跑到我这里来了。那一天，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她穿着一身土里土气的蓝士林布大褂，脚上是一双家做的圆口千层底布鞋，脑后梳着个小抓髻，怯生生地站在我的跟前。我看着她那低垂的眼皮和那副略显憔悴的面容，气呼呼地问她：“哎——你怎么连个信也不捎就抽冷子跑到这来了？”

她抬眼看看我，慌乱了一阵子，然后才吭吭吃吃地向我说：“家里被斗，被分了，人家也拿我当地主婆待，我没法过下去，妈妈这才打发我来找你讨个主意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一股泪水“刷”地从她的眼睛里流了下来，跟着她用手捂上脸，抽抽噎噎地哭个没完。

拿她当地主婆？这才是冤了她呢。我心里话，尽管她嫁了我，可我从来也没从心里拿她当个尊贵人。在家里她除了干活，就是受气，到头来也跟着沾个地主的光，真是哪庙都有屈死鬼，实在不太公平。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她到底还是入了地主的门嘛。

她一名二声地找来了，撵她走吧，名声不好，再说总还有点夫妻的恩情吧，没办法，我只好暂时把她留下了。

跟她生活在一起我是不甘心的。一来她比我大两岁，

二来我认为她根本不会生活。她不懂爱情，当然也不会在爱的领域里给我带来什么安慰。而她唯一可取的就是能尽心尽力地侍候我。我一起床，牙膏挤好了，洗脸水放眼前了，我往桌旁一坐，饭端上来，筷子递到我手里。吃完饭，我把碗筷一撂抹抹嘴没事了。别人都说我有个好“内闾”，好后勤，可我心里却“鼓鼓球球”地总觉得缺点啥。有时我心不顺了就故意找她的茬子，不是饭硬了就是菜咸了，甚至还骂骂咧咧给她点颜色。我的意思很明显，她再怎么勤快，也配不上我，我总该找个现代化的新式伴侣才行。

可是不久，婚姻法公布了。街道上挨家检查，对我进行了旁敲侧击的干涉；单位也给了我警告，启发我从思想上检查那种瞧不起劳动妇女的思想和亏待糟糠的行为。

知识分子的弱点就是这样，好高骛远，而又脑瓜皮薄，运动一来，我害怕了。本人出身不好，而知识分子又是团结改造对象，我不愿意因为这么个生活问题影响自己的事业，甚至担上个欺压贫下中农的罪名。（土改那咱人家拿她当地主婆看待，现在为了教育和批判我，她又荣幸地恢复了贫下中农身份，有些人说这就是政策的灵活运用。）不过说句实在的，我也有点天良发现，觉得她跟我过日子，确实不硬气，我也不应该高人一等。这样内外一夹攻，我也就只好认了。

没有了外心，我对工作就更加刻苦钻研了。洪洋河矿区是个超级瓦斯矿区，解放前威胁矿工生命，影响生产的大害之一就是瓦斯事故。一九四二年震惊世界的瓦斯大爆

炸，死伤几千名矿工的惨案就发生在这里。解放后，我们采取了很多有力措施，虽然总算把瓦斯控制住了，但还是人力操作，局部解决，不能根除祸害。我想，要使矿山真正成为自己的矿山，跟上生产不断发展的需要，必须搞瓦斯观测联动化，用电子控制。那时，我正壮年，思想敏感，头脑灵活，加上我这个想法又得到很多同行的推崇，于是，我很快就投入了这项新工艺研究的热潮中。在那些日子里，我白天和工人一起，在井下巡回探索，调查实践，晚上就坐在灯下学外文、翻资料、查数据，一干就是半宿。而她呢，也总是毫不疲倦地陪着我。白天，她千方百计地让我吃好，晚上，她就静静地拿着个千层鞋底做呀，纳呀……偶尔，她看我高兴，也会怯怯地问我：“你用这么大的劲，这个事特别重要吗？”

赶上我兴致好，又是有话要说的时候，我也会兴冲冲眉飞色舞地告诉她：煤是怎么生成的，瓦斯是怎样爆发的，这种毒气多危险，我这项工作又是多重要。赶上我心里不顺，我就会堵她几句：“算了，跟你说你也不懂。”不管我什么态度，我觉得出，她把我的工作看得特别重要，在我们家里是高于一切的。只要我往书桌前一坐，她马上屏息掩声，走路都要踮着脚。凡是我画的写的每一个纸头，她都要精心地归拢起来保存好。

经过几年的钻研，我的《瓦斯自动化控制方案》到底出手了。经过反复的掂量，我终于鼓起勇气信心百倍地把它交给了我的上级田大中矿长。

我们矿长是个老矿工出身的干部。这人作风实，干活

好，对完成采煤任务抓得死死的，可就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：维持现状，对新事物接受的慢，特别是对所谓“洋”的东西，简直是天生的反感。他看完我的方案，连提请党委研究都没有，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。他坐在自己做的土圈椅里，眼望着我的脸，一口气向我提出了一大串问号。他问我：什么叫电子控制，这是哪个国家的东西，你有实地考察没有？这么大个矿区，方圆上百里，一个火花就要波及全矿，这责任谁来负？电子控制设备从哪来，需要多少投资？你能不能保证这个设计百分之百成功？等等。这些问号简直不是研究和审查方案，而是象轰然盖顶的火箭炮，打得你晕头转向。我瞅着他的脸说：“我怎么敢打这样的保票呢。”

他提这些问题就是为了叫我收回方案，见我没敢下保证，他这才给我下个结论，依他看，这个方案纯属洋套子，在咱们矿井实施不了。我想解释解释，他不听，倒批判我说：“你们知识分子，学的洋东西太多，爱标新立异出风头，得彻底改造。”

这个结论，屈了我的心，打击了我的热情，我一下颓靡下来。我书也不看了，图也不画了，每天回家往床上一躺，唉声叹气。躺闷了，就叫她炒点菜，喝上二两老白干。

我的情绪，当然逃不过她的眼睛，她对我侍候得更加尽心尽意了。有时我闷不过发发牢骚，她就大着胆子劝我：“这个矿长保守不识货，你不能换个庙门，把它给上边看看吗！”

开头，我没拿她的话当回事，撒气地申斥她说：“你

大字不识，懂个啥，少跟着掺和——”慢慢地，我觉得她说的也有理，不该一棵树上吊死人嘛。于是，我听了她的话，认认真真的写了封申诉书，把设计方案送到煤炭部去了。

不久，煤炭部批转下来。他们认为我的设计方案，对建设新矿山，促进煤矿生产的机械化建设很有价值，指示洪洋河煤矿党委给予认真的考虑，而且还批评了矿长田大中不支持新技术的错误态度。

她的招真出对了，结婚后，我第一次觉得，她不是个“白吃饱”，这个主意出的还真不错。可世间的一切事物总是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，尽管煤炭部作了批复，但是田大中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；他虽然不再象过去那样公开反对，实际上却采取了暗中抵制的办法，软拖硬泡，把这个设计方案扣压下来。

对于他的作法，我更加有意见。

就在这时，党的整风运动开始了。党组织向党内外同志发出了广泛征求意见的号召。我对田大中是有意见的，但是提不提呢？我患得患失的属性使我很苦恼。提吧，怕说重了引起人家的不满，给小鞋穿；不提吧，憋在心里的意见，再看看设计方案在那里遭虫蛀实在难受。这时，她又起作用了。她看我在家里直转磨磨，跟着我的脚后跟对我说：“你有话说嘛。毛主席，共产党给咱们推翻了三座大山，把咱们解放了，咱们还有什么话不能向党说呢！说说吧，让党知道咱们在想啥。”

这一回，她讲得很硬气，一反过去那种怯生生的样子。我的心又被她说活了，真的，有话向党说，怕什么

呢？说对了，对党有帮助，说错了，“言者无罪”嘛，党可以帮助我改正，有啥可怕的。我又一次觉得，她到底是个贫下中农，比我想的远。于是，我在党委召开的征求意见座谈会上，慷慨陈词地说了我对矿长的一切看法。我批评了田大中的保守思想，也提出了他对知识分子的错误看法。还揭发了他对煤炭部改造旧矿山，推行新技术的阳奉阴违态度。

那一次，我情绪很激动，说的真痛快，博得了许多同志的好评。我也觉得我跟党又靠近了一步，我能和党说真心话，这不正好说明我和党没有二心吗？

但是出人意外的灾难却发生了。时隔不久，这位矿长就借着一股风势，反手一击，抓住我提意见时的只言片语，给我扣上了“崇洋迷外”，“诬陷和反对党的领导”，“分庭抗礼”，“独霸技术大权”的大帽子，加上我的地主成份，不许我分辩，立即把我划成了右派分子。

这个打击太大了，我一下子成了全矿务局斗争的众矢之的。我被剥夺了一切发言权，成为“专政对象”、“落水狗”和“反动派”。

我痛苦得眼泪都要哭干了，可有什么办法呢？在强大的压力下，我只好作些违心的检查。回到家我把一切怨气又都发泻到她身上。外边挨批斗，回到家里我就找她撒气。我跺着脚埋怨她：“倒霉就倒在你身上，如果不是你瞎参谋，我那个设计方案不会寄到部里去，我也不会写申诉书，更不会抛头露面去提意见……

对于我的责难，她却破例地不服起来，几乎是第一回

和我针锋相对地说：“怎么会这样？建设社会主义的好办法往上提一提就犯法吗？党要整风，让咱们提意见，他田矿长还兴倒打一耙呀，我，我替你找他们去……”说着，她就开开门跑出去了。我抓她一把没抓住，我喊她，她也没理我。

事后，我听别人告诉我，她在矿长室里，和田大中吵得很凶，句句在理，把矿长顶的“喂喽喂喽”的，真不孬！

谁想到，经她这么一闹，我的罪反倒加重了。两天后他们通知我，因为我态度恶劣，负隅顽抗，叫我爱人去替我翻案，罪加一等，升为“极右分子”，开除留用……

我的天哪！她又给我惹了大祸。我这苦可到哪里去诉啊！回到家里，抬手就给了她一巴掌，我说：“都是你惹的事，不叫你我哪能步步高升……”

她捂着脸，满面泪痕地说：“你要相信党，党不会让他们这样做的，总有一天，党会查他们，党会给咱们撑腰……”

我想不到，她一个大字不识的童养媳会说出这样的话，会对党充满这样坚定的信念。当时，我根本就没那份闲心去琢磨她这个预言。但是有一个使我终生后悔的事，就是我不该打了她一巴掌。

我被停止工作了，每天扫厕所。同志们见了我都不敢说话，我也不好给别人添麻烦，“划清界限”嘛，当然就得自己多检点。我每天除了请示工作而外，就没有我说话的地方了。但我回到家里，却把憋了一天的心里话，统统讲

给她听，她也有一肚子话跟我讲。从前她由“地主婆”恢复到贫下中农，现在又成了右派家属。但她对这个却毫不在乎，她认为早晚会有昭雪那一天，所以她仍然鼓励我搞设计。

有一天，我闲着无事，打开抽屉一下子翻腾出我那一堆《瓦斯自动化控制设计方案》的底稿。底稿显然是经过她细心地归拢过，一张张一页页用线装订得整整齐齐，后面还附着我每次申诉的信底。我一看这些东西就伤心，伸手取过火柴说“这些玩艺还留它干啥？那份设计都放进我的档案里当罪证啦，这还留本‘变天帐’！”

看我要烧，她慌忙一把夺了过去，心痛地说“你呀，留着它吧，早晚总会有用处的，你说的那些瓦斯总是要治的。”

说实话，我也真舍不得烧它，这是我几年的心血和希望啊！然而它却使我受到如此令人难忍的委屈和折磨，它使我离开了人民，离开了党。我吃饭，走路，躺到床上心都疼。我看着她把这些底稿精心精意地收拾起来，我说不清是个什么滋味。

一晃十年过去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。狂涛中的逆流又把我这个小小的浮萍卷了进去。尽管这些年我压住舌头不在外面说话，不管事，不抬头，不交往，那些人还是翻了我的旧帐，把我又列为五类分子、“老洋奴”，关进了牛棚。特别使我难以想象的是，我们那位整过别人的老矿长——田大中竟也成了我们这个牛鬼蛇神队伍中的一员，和我成了同牢犯。这次，我受的波及就更大了。不但我被